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經世思想與晚清史學

A Study of Statecraft deal and Late Ch'ing Historiography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4-011

執行期間：88年8月1日至89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彭明輝

處理方式：可立即對外提供參考

一年後可對外提供參考

兩年後可對外提供參考

(必要時，本會得展延發表時限)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2001年2月20日

經世思想與晚清史學

中文摘要

關鍵詞：

晚清、邊疆史地、經世思想、史學、西力衝激

清乾嘉時代的史學以考據為主，梁啟超稱此一現象為“以復古為解放”；余英時則借用“回向原典”的觀念加以解釋；嘉道之際，史學風氣為之一變，轉而向經世訴求；下迄晚清，其主要線索乃係繼承經世理路，相關主題包含下列項目：

- (一) 經今古文之爭：經今文學運動引發的變法論與辨偽風氣。
- (二) 當代史的修纂：由魏源《聖武記》開啓研究清代典章掌故的先聲，從而史學的經世致用受到重視。
- (三) 外國史地之學：由於西力叩關主要來自海上，清季知識分子研究外國史地之學乃係爲了制夷。
- (四) 邊疆史地研究：此爲延續清中葉以降的元史研究而來，加上清季的陸上外患主要來自西北，形成研究西北史地的學術風氣。

(五) 重視歷史教育：西方新史學思想輸入中國以後，引發了改編國史的運動。

本文將上述晚清史學發展的重要論題，邊疆史地研究、經世史學、經今古文之爭與變法論、改編國史運動與歷史教育，融為一體，解釋晚清史學的各種面向，而以經世思想貫穿。

晚清史學的發展，時代變局的影響是其主要成因，一方面是清代學者的由考據到經世的轉折，另一方面則是西力衝激的影響。就一般考察所得，晚清史學乃源於樸學考據，惟與 1840 年代以降中國的迭歷外患，亦有相當密切之關連；因此，樸學考據與經世乃係近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雙主題，而在檢討晚清史學動向與時代的變局的關連時，由考據到經世的理路乃歷歷可考，本文主要即透過經世思想之理路，探討晚清史學的重要轉折。

A Study of Statecraft deal and Late Ch'ing Historiography

Digest

Keywords:

late Ch'ing, frontier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atecraft deal, historiography, western impact

The historiography achievement in Ch'ing period of Ch'ien Chia (1736-1820), which focused primarily on textual research, had been discussed by many scholars. Liang Ch'i-ch'ao called this period "liberation from reviving old traditions"; and Yu Ying shi had tried to use the idea of "return to resource" to illuminate this academic atmosphere. Beginning from the period of Cha-Dao (1796- 1850), historiography was changing form textual research to statecraft ideal. We can summarize some related subjects in the changing process as follows:

1. The movement of neo- old textual debating "經古文之爭": which gave rise to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of dialectics of ancient text.
2. Compiling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pioneering from Wen Yuan's

The Record of Holy King 《聖武記》, the research of Ch'ing's classics extended to a new territory, and therefore, made the historiography of statecraft ideal valuable.

3. The learning of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e Western intrusion had forc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try to underst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order to resist Western powers.
4. Studies of Chinese frontier history and geography: a traditio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Middle Ch'ing period, and was strengthened by the awakening of the Russia's invasions.
5. Emphasized historical education: as a result of Western new history enter China, it gave rise to a movement of revision native history.

Brief survey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te Ch'ing historiography,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derives form the new prospect of epoch: on the one side is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on native north-western frontier, on the other side is the western impact, which duce the storm of introducing foreign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sum, the development of late Ch'ing historiography originated form textual research, but it was also affected greatly by western impact since 1840s. This article, therefore, aims at analyzing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rise of late Ch'ing historiograph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tatecraft ideal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目次

中文摘要.....	iii
Digest	v
第1章 導論.....	1
第2章 從元史研究到西北史地.....	7
一、以考據為中心的《元史》校勘與增補.....	8
二、西北史地蔚為顯學.....	19
三、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	30
四、小結.....	36
第3章 開眼看世界：外國史地引介.....	43
一、經世思想與認識西方.....	43
二、晚清知識分子的外國史地論著.....	45
(一) 魏源《海國圖志》及其經世思想.....	45
(二) 徐繼畲《瀛環志略》的世界知識.....	53
(三) 姚瑩《康輅紀行》的域外史地.....	58
(四) 外國史地引介的新動向.....	61
三、外國史地著作的翻譯.....	72
四、小結.....	77
第4章 今文學派與變法論：以廖平為中心的討論.....	79
一、廖平的生平.....	82
二、師友交遊.....	85
三、廖平的經學思想.....	87
(一) 經學六變概述.....	88

(二) 經學六變之歷程.....	94
四、廖平與康有為.....	95
(一) 《新學偽經考》與《闡劉篇》比較.....	96
(二) 《孔子改制考》與《知聖篇》比較.....	96
(三) 康有為剽竊說.....	97
五、小結.....	99
第5章 經世思想與史學動向：以魏源為中心的討論.....	101
一、魏源的生平.....	101
二、紹述聖王武功的《聖武記》.....	107
三、依違考據與經世之間的《元史新編》.....	109
四、放眼世界的《海國圖志》.....	111
五、小結.....	114
第6章 外國史地譯介與改編國史運動.....	117
一、晚清學者的努力.....	118
二、從譯介西書到改編國史運動.....	120
三、教科書的翻譯與編寫.....	123
(一)曾鯤化的《中國歷史》.....	126
(二)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	126
(三)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	128
四、小結.....	129
第7章 結論.....	131
徵引書目.....	135
一、中、日文部分(依姓名筆畫序).....	135
(一) 專書.....	135
(二) 論文.....	138
二、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英文字母序).....	141

第1章

導論

清乾嘉時期的史學以考據為主，學者究心於此者甚多，相關研究亦較引人矚目¹，因而容易造成一普遍性之觀念，即以樸學考據為清代史學之主流；梁啟超稱此一現象為“以復古為解放”²，余英時則借用“回向原典”的觀念加以解釋³；嘉道之際(1796- 1850)，史學風氣為之一變，轉而向經世訴求⁴；下迄晚清，其主要線索仍係繼承經世理路，相關主題包含下列項目：

1. 經今古文之爭：經今文學運動引發的變法論與辨偽風氣。
2. 當代史的修纂：由魏源《聖武記》開啓研究清代典章掌故的先聲，從而史學的經世致用受到重視。
3. 外國史地之學：由於西力叩關主要來自海上，晚清知識分子研究外國史地之學乃係爲了制夷。
4. 邊疆史地研究：此爲延續清中葉以降的元史研究而來，加上晚清的

¹ 杜維運教授曾就清代史學與宋代史學孰優孰劣進行討論，此係對陳寅恪謂清代史學不如宋代之說所做之論辨；參考：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1-14; 271-315; 369-390。

²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13。

³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史學評論》，5(台北，1983. 1): 19-98。

⁴ 陸寶千，《嘉道史學》，《清代思想史》(台北：廣文書局，1983)，277-322。

陸上外患主要來自西北，形成研究西北史地的學術風氣。

5. 重視歷史教育：西方新史學思想輸入中國以後，引發了改編國史運動⁵。

事實上，在傳統中國史學中，有關邊疆史地的研究，向來處於在正統史學的邊緣地位，即使在清中葉後雖一度成為顯學⁶，但大部分時期則是不受重視的。

有關晚清史學的研究，在台灣史學界向來較不受重視，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相關研究的焦點集中於變法與革命，即使有關經世思想部分，重心亦在救亡圖存的變法思想之相關論題，而少及於史學的討論。

1983年8月25日至27日，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其中有多篇論著從傳統的角度出發，論析經世思想的成因；如：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周啓榮、劉廣京，〈學術經世：章學誠之文史論與經世思想〉，孫廣德，〈龔自珍的經世思想〉⁷；其中僅周啓榮、劉廣京，〈學術經世：章學誠之文史論與經世思想〉的討論與史學較直接相關，除此之外，大部分論文仍集中於政治／思想層面：

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⁸；是相關著作中對晚清史學發展做較全面討論的一篇，對筆者的研究有許多啟發，其中有關清季今文學與史學的討論，指引出相關研究的可能方向，但因此文在資料的援引上並不豐富，啟發的意義大於驗證，進一步的研究尚待後人之努力。關於清季今

⁵ 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2(北京，1949.10):1-35。

⁶ 杜維運，《中國歷史地理·清代篇》，收入：石璋如等，《中國歷史地理》，第3冊(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7；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收入：台灣大學歷史系(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2)，1611-1650；有關清儒重視邊疆史地的討論在1612-1613；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華岡出版公司，1977)，3-4。

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3-19；117-156；275-289。

⁸ 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2(北京，1949.10):1-35。

文家的歷史解釋，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精闢的見解⁹，不過他的研究主要是為古史辨運動找出源頭線索，有關晚清史學的形成並未費心著墨。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對近百年中國史學發展做了一個鳥瞰式的巡禮¹⁰，指出其中的線索，惟目錄的意義大於研究成績。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書中有關近百年史學的討論亦大抵類此¹¹。

對清代史學研究用力甚勤的杜維運教授，其研究重心為乾嘉時期的史學，其《清代史學與史家》所論主要即清初至乾嘉時期的史學¹²，嘉道以後的史學則討論甚少；有關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問題，杜維運教授〈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一文，將清季以降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過程與內容，做了詳密的考證¹³；惟此文對有關經世思想與史學研究間的關連，未有進一步的討論。

王家儉教授是研究魏源的專家，其名著《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和《魏源年譜》，主要皆將焦點集中於經世思想或海防思想¹⁴；〈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以魏源的史學為論述主體，對經世思想與史學發展之間的關連多所闡發¹⁵。

大陸地區的學者對相關論題似乎興趣較為濃厚，袁英光、桂遵義，《中國近代史學史》，對近代史學的討論層面甚廣¹⁶，但此書在徵引資料時常不符學術要求，且常以論代史；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

⁹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61-208。

¹⁰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

¹¹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台北：鼎文書局，1983），329-387。

¹² 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

¹³ 杜維運，〈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聽濤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5），137-192。

¹⁴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台北：大立出版社，1984）、《魏源年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

¹⁵ 王家儉，〈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報》，21（台北，1993.06）：155-172。

¹⁶ 袁英光、桂遵義，《中國近代史學史》（上）（下）（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在經世思想與史學發展的論題上著墨甚多¹⁷，但此書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其一是濃厚的馬克思史學主導了相關的歷史解釋；其二為書中甚多資料的徵引不明確，令讀者難以按圖索驥；馬金科、洪金陵《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敘論》在資料徵引上稍較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嚴謹，但亦難脫馬克思主義史學之歷史解釋框架¹⁸。

清學由考據到經世的因素固有多端，外患則為其最直接之觸媒，由於外患的紛至沓來，使得知識分子不再以訓詁為治學的終身職志，更多的知識分子開始思索時代變局中的因應之策，如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以及康有為的“託古改制論”，都可謂係時代變局下之產物；其間固有西力衝激之挑戰與回應，亦有傳統中國變法論的延伸；而在面對時代變局的因應之道中，經世史學的興起，乃係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事實上，在傳統中國史學中，有關邊疆史地的研究，向來處於在正統史學的邊緣地位，即使在清中葉後雖一度成為顯學¹⁹，但大部分時期則是不受重視的：

清中葉乾嘉以降的邊疆史地研究，最初係由改編《元史》開其先聲，錢大昕、魏源，均有所獻替；、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屠寄《蒙兀兒史記》、柯劭忞《新元史》，則為晚清的元史研究畫下句點²⁰。除了上述研究元史的三大家之外，晚清研究邊疆史地的名家輩出，如：張穆《蒙古游牧記》，何

¹⁷ 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¹⁸ 馬金科、洪金陵，《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敘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¹⁹ 參考：杜維運，《中國歷史地理·清代篇》，收入：石璋如等，《中國歷史地理》，第3冊（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7；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收入：台灣大學歷史系（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2），1611-1650；有關清儒重視邊疆史地的討論在1612-1613；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華岡出版公司，1977），3-4。

²⁰ 雖然柯劭忞的《新元史》於1920年成書，1922年刊行，但因其書屬舊史體，仍應畫入晚清史學加以討論：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2: 14-15；袁英光、桂遵義，《中國近代史學史》（下）（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315。

秋濤《朔方備乘》，徐松《西域水道記》、《新疆識略》，丁謙《西域傳考證》等²¹，這些著作均係以邊疆史地研究為國防地理做張本。

由 1840 年代以降之邊疆史地著作，可以略窺時局變化對史學動向的影響。因此，考察晚清史學的發展，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之間，常存在一種微妙的互動關係。

就一般考察所得，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學乃係源於樸學考據，惟與 1840 年代以降中國的迭歷外患，亦有相當密切之關連；因此，樸學考據與經世思想乃係晚清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雙主題，而在檢討晚清史學動向與時代變局的關連時，由考據到經世的理路乃歷歷可考，從元史研究到西北史地係其中之一重要關鍵。

1840 年代以降的變局，使得中國知識分子重新思索民族命運及文化的未來方向，而這些論點常採用藉求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模式，雖然這類模式為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所慣用，但在其中卻也蘊入了新的趨向，如魏源《海國圖志》與徐繼畲《瀛寰志略》即藉求地理知識之擴充，以喚醒國人的認知；可惜魏源與徐繼畲的著作對日本雖造成極大的影響，在中國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但由魏源、徐繼畲所開啓的研究世界地理風氣卻方興未艾，其中研究邊疆史地與世界史地風氣的興起，尤為近代中國史學開闢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晚清史學的發展，時代變局的影響是其主要成因，一方面是清代學者的西北史地研究，另一方面則是西力衝激的影響，引發介紹外國史地的風

²¹ 這方面的討論，參考：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學述略〉，《東方雜誌》，28. 21: 61-82；李思純，〈元史學〉，收入：楊家駱(主編)，屠寄，《蒙兀兒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73)，第6冊，附錄，61-74；胡達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34-52；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39；王聿均，〈徐松的經世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181-197；王爾敏，〈施榮之經世思想及其對域外地志之研究〉，《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201-229；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359-390；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冊，4-6。

氣。

爲了對付西方列強的侵略，研究外國史地的風氣因而興起；魏源的《海國圖志》即藉求地理知識之擴充，以喚醒國人的認知；徐繼畲的《瀛寰志略》，以地爲經，以史爲緯，開啓研究世界地理的風氣，加上其書簡明易讀，較魏源之書尤爲風行。在世界歷史方面，大部分的著作譯自日文或西文，其中以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新史攬要》最爲通行，其他尚有《萬國史記》、《萬國通史》等。梁啟超於 1902 年發表〈新史學〉，對傳統中國史學猛烈抨擊，並積極介紹外國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了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的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使得晚清新式學堂的歷史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變，一方面藉用西方式的章節體教科書，另一方面將歷史教育與經世思想相結合；冀求藉由歷史教育形塑民族精神並賦予經世之重責；因此，壓縮式的、簡明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成爲改編國史運動的主體；而對西方的認知亦屬急迫，翻譯西文的簡明教科書或改寫西洋史教本，也成爲另一種特色，其目的在短時間內使學習者獲得簡明的、廣泛的、多面向的中國與世界史地知識。

本文主要的焦點爲從元史研究到邊史地的轉折、經今古文之爭與變法論、經世思想與史學動向、改編國史運動與歷史教育等，希望將上述問題以經世思想的線索加以貫穿。

第2章

從元史研究到西北史地

在傳統中國史學中，邊疆史地研究向來處於在正統史學的邊緣地位，即使在清中葉後雖一度成為顯學¹，但大部分時期是不受重視的。

清中葉乾嘉以降的邊疆史地研究，最初係由改編《元史》開其先聲，錢大昕在這方面用力甚勤，考訂亦精²，魏源則完成了《元史新編》，而洪鈞博採西籍補正《元史》，成《元史譯文證補》，是晚清有關元史著作中最為學者所稱道者；屠寄將元初開國武功和西域諸汗國的史實，用紀傳體裁作《蒙兀兒史記》，對蒙元史研究有相當大的貢獻；柯劭忞廣續前人的研究成績編成《新元史》，則為晚清的元史研究畫下句點³。

¹ 參考：杜維運，《中國歷史地理·清代篇》，收入：石璋如等，《中國歷史地理》，第3冊(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7；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收入：台灣大學歷史系(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2)，1611-1650；有關清儒重視邊疆史地的討論在1612-1613；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華岡出版公司，1977)，3-4。

² 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學述略〉，《東方雜誌》，28. 21(上海，1931. 11. 1): 61-82；有關錢大昕的討論在頁72-73。

³ 雖然柯劭忞的《新元史》於1920年成書，1922年刊行，但因其書屬舊史體，仍應畫入晚清史學加以討論；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2: 14-15；袁英光、桂遵義，《中國近代史學史》(下)(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315。

除了上述研究元史的三大家之外，晚清研究邊疆史地的名家輩出，如：張穆《蒙古游牧記》，何秋濤《朔方備乘》，徐松《西域水道記》、《新疆識略》，丁謙《西域傳考證》等⁴，這些著作均係以邊疆史地研究為國防地理做張本。

由 1840 年代以降之邊疆史地著作，可以略窺時局變化對史學動向的影響。因此，考察晚清史學的發展，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之間，常存在一種微妙的互動關係。

就一般考察所得，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學乃係源於樸學考據，惟與 1840 年代以降中國的迭歷外患，亦有相當密切之關連；因此，樸學考據與經世思想乃係晚清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雙主題，而在檢討晚清史學動向與時代變局的關連時，由考據到經世的理路乃歷歷可考，從元史研究到西北史地係其中之一重要關鍵。

一、以考據為中心的《元史》校勘與增補

傳統中國的學術分類，雖有經史子集之別，但學問之間的界線其實很難清楚畫分；其中史學與經學的關係尤其密切，深治史者鮮少有不通經的，其主要關鍵在於傳統中國史學中，建構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本來就是六經，從王陽明“五經亦史”到章學誠“六經皆史”，都點出了經和史的密切關係⁵，

⁴ 這方面的討論，參考：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學述略〉，《東方雜誌》，28. 21: 61-82；李思純，〈元史學〉，收入：楊家駱(主編)，屠寄，《蒙兀兒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73)，第6冊，附錄，61-74；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34-52；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39；王聿均，〈徐松的經世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181-197；王爾敏，〈姚瑩之經世思想及其對域外地志之研究〉，《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201-229；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359-390；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冊，4-6。

⁵ 關於“六經皆史”的起源與發展過程，參考：錢鍾書，〈談藝錄〉(香港：龍門書店，1965)，315-319。

而這種關係在傳統儒學中是無可取代的。清中葉乾嘉時期(1736-1820)，考據之學蔚為普遍風尚，經學家如惠棟、王念孫、孫星衍，皆不乏考據之作⁶，主要的原因即為經史未有明確的界線；而由考經到考史的過程，使清代學術形成“回向原典”的探本溯源，試圖通過整理經典文獻，以恢復儒家的原始面貌；且因考據在經史之間逐漸形成專業的分途發展，使得清學漸具客觀學術的窠形⁷。

清乾嘉時期的考據之學，源於整理經典文獻以恢復原始的儒家面貌，其後漸轉向史學訴求，此一時期的考據大師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人，均以正史考據名世⁸。其後考史由正史考訂轉向集中於遼、金、元史研究，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此三史倉促修成，在正史中最為蕪穢紕繆，亟須後人整理，在史學工作上亦自較他史為急⁹；在考訂遼金元史的過程中，為了瞭解其疆域建置、盛衰變遷之機，非致力於輿地研究不為功。清乾嘉時期以降的學者，因研究遼金元史，乃考求三史之地理，三史之地理即西北地理，此為西北史地興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又以元史最受學者青睞¹⁰。

清乾嘉時期以前，已有學者究心於元史研究，較有成就者如邵遠平、汪輝祖、孫承澤等人。邵遠平撰《元史類編》42卷，汪輝祖撰《元史本證》50卷；孫承澤撰《元朝典故編年考》；均係以考據為中心的《元史》校勘與增補，考據手法主要以《元史》前後文互證，及以元代文集補充《元史》之不足。孫承澤輯錄《元朝秘史》，邵遠平撰《元史類編》，依據元代文集，

⁶ 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據學〉，《清代史學與史家》，277-322。

⁷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自序〉，5-6。

⁸ 乾嘉考據三大家：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均以正史考據為主；參考：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據學〉，《清代史學與史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277-322。

⁹ 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學述略〉，《東方雜誌》，28. 21: 69-70；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收入：台灣大學歷史系(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612。

¹⁰ 馬金科、洪金陵，《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敘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71; 95-100。

增加了許多傳記篇章，並且利用《元典章》、《聖武親征錄》等資料，補充《元史》之缺漏。基本上，清代前期的元史研究，主要均著眼於史料的證補與校勘¹¹。

清乾嘉時期考據三大家中，對《元史》用力最勤的是錢大昕(1728-1804)，其《廿二史考異》被視為乾嘉考據最具代表性之著作，全書 100 卷，其中《元史》占 15 卷，對《元史》做了相當詳密的考證工作。在修補《元史》方面，錢大昕的主要成績有三：

1. 考察元代譜系，著《元史氏族表》3卷，這部分的工作廣泛蒐集文集、碑刻等資料，加以考證、整理，糾正了《元史》中的一些謬誤。此外，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對元史亦有許多相關的考證¹²；《潛研堂全集》中有關《元史》部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對所收元代碑刻所做考證，都為元史研究提供許多史料的依據。
2. 撰《元史藝文志》4卷，彌補《元史》所缺漏的《藝文志》。
3. 指出《元朝秘史》、《聖武親征錄》的史料價值；《元朝秘史》又名《蒙古秘史》，據後代學者的考證寫於13世紀中葉，內容記述成吉思汗先世及其一生事蹟，至窩闊台時期蒙古族的興盛與建立元朝以前的歷史，乃《元史》較缺漏的部分。《元朝秘史》的蒙文本已散佚，錢大昕從《永樂大典》抄錄漢字音譯本¹³。《聖武親征錄》成書於元世祖時期，主要記述成吉思汗與窩闊台兩汗事；錢大昕因懂蒙文，首次

¹¹ 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韓儒林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781；唐景升將清代學者的西北史地研究分為三期：第一期為自康熙至乾隆期間，第二期為乾嘉至同光年間，第三期為光緒以後數十年間；本文所謂清代前期的元史研究即唐景升分期中的第一期，參考：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學述略〉，《東方雜誌》，28. 21: 61- 82；有關分期的討論在頁71- 72。

¹²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7.8.9/149- 295。

¹³ 《元朝秘史》為蒙古王室的秘史，元朝末代君主元惠宗出走大都時帶走蒙文本，明太祖時獲取了這些圖籍，並令人翻譯，底本因未收入《永樂大典》而遺失，僅將漢字音譯本收入大典中，錢大昕再由《永樂大典》輯出，對運用此一史料有拓之功；參考：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韓儒林文集》，775。

運用這些資料研究元史，開啓元史研究的新頁。

錢大昕的元史研究，在史料考證方面，運用元代各種文集、碑文，彌補《元史》之不足，加上他本身懂蒙古文，在史料的開拓上，爲後人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¹⁴。可惜的是錢大昕所著《元史稿》未傳於世，無法盡窺其研究元史的成績。

嘉道時期(1796- 1850)以後，元史研究兵分兩路，一路繼續走考據塗徑，一路則以經世爲主要訴求，其中的關鍵人物是魏源。

雖然與魏源前後的徐松和龔自珍，均有心於邊疆史地研究，且與經世思想相結合¹⁵，但龔自珍的文稿大部分遭焚毀，難以盡窺全豹；徐松(1781- 1848)《西域水道記》、《新疆識略》，爲此一時期有關邊疆史地的名著¹⁶。魏源的《元史新編》，則代表考據與經世結合的元史研究新方向，一方面他本人具有濃厚的經世思想傾向，另一方面《元史新編》依舊以考據爲主要訴求；在《元史新編·自敘》中，魏源寫道：

鑒於前朝疆域未有廓於元者，而史書之蕪蔓疏漏亦未有甚於元者，爰發憤重修，采四庫書中元代各家著述百餘種，並廣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類各書。¹⁷

魏源所參考的資料除了《元史》之外，尚有元代文集、史籍、《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考》等。從史料的角度觀察，魏源是清初至嘉道時期，研究元史徵引漢文史料最多的學者¹⁸。尤其可貴的是，魏源深刻瞭解元代是中國歷

¹⁴ 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學述略〉，《東方雜誌》，28. 21: 72-73。

¹⁵ 參考：張壽安，〈龔定著的經世思想〉，《漢學研究》，10. 2(總號20)(台北，1992. 12):173-191；王韋均，〈徐松的經世思想〉，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181-197。

¹⁶ 關於徐松的討論請參閱本文第3節〈西北史地蔚為顯學〉。

¹⁷ 魏源，〈元史新編·自敘〉，《元史新編》(光緒31年，慎微堂刻本)，1。

¹⁸ 魏源的《元史新編》起筆於道光27年(1847)，同治6年(1853)年完成，同治6年(1854)托浙江巡撫何桂清奏進，魏源爲此撰〈擬進呈《元史新編》表〉，但因此時逢太平天國事變，戰事膠著，《元史新編》並未順利進呈；次年魏源因病辭世，文稿存於龔自珍家中，後入莫芝祥之手；其後魏源的後人魏光燾任職陝甘新疆時重獲《元史新編》手稿，債邵代

史上版圖最寥廓的朝代，因此他認為研究元史必須具備世界眼光，爰此蒐集西人著作，採入其書；可惜因語文能力與條件所限，魏源所徵引的材料學術價值並不高。《元史新編》所徵引的西文著作主要是馬禮遜《外國史略》、馬吉士《地理備考》，此二書經後代研究元史學者的考證，均非有學術價值之著作，對魏源的元史研究，並未能有太多突破性的幫助¹⁹。但魏源運用西人著作的用心，則為其後之學者所繼承，為元史研究打開了另一扇視窗：

《元史新編》繼承清代初期至嘉道之際的元史研究成果，包括邵遠平《元史類編》的本紀、錢大昕的《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等；另外，魏源也補充了《元史》忽必烈以前的缺略部分(太祖、太宗、憲宗本紀)，增加部分列傳，如〈太祖平服各國傳〉、〈太宗憲宗兩朝平定服各國傳〉、〈中統以後屢朝平服叛藩傳〉²⁰；糾正《元史》部分一人兩傳的繆誤；此外，魏源亦依據元代的特點，添增〈釋老傳〉、〈遺逸傳〉等篇。對研究元史最感棘手的地理問題，魏源也做了許多廓清的工作，邵代過在跋文中即盛贊其事：

窮荒絕域，數百年如墮雲霧者豁然得睹，其方位雖間有疏略，而其高瞻遠矚，……開榛莽而啓津途。²¹

魏源在地理方面的用心，使得研究元史的學者因而可以按圖索驥，雖然並非相關考據都正確無誤，但確已釐清許多懸宕疑案。

在《元史新編》中，魏源取消了〈五行志〉，並刪除〈天文志〉中的天災部分，這些原屬傳統中國史學比較怪力亂神的部分，魏源認為徒增歷史的迷霧，反令人看不清史實的真象²²；而他之所以加強〈歷志〉，則是強調民時對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魏源說：

過等人整理校勘，於光緒31年(1905)始由湖南邵陽魏氏慎微堂刊行，距此書之寫成已歷50年。

¹⁹ 馬金科、洪金陵，《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敘論》，75。

²⁰ 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學述略〉，《東方雜誌》，28. 21: 74-75；馬金科、洪金陵，《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敘論》，76。

²¹ 邵代過，《元史新編·跋》，魏源，《元史新編》，1。

²² 正史出現〈五行志〉始於班固《漢書》，在這方面學者有正反不同的意見，贊同者認為

歷以授時，如置閏、步日、步月、測中星，皆敬天勤民之巨典，五星之遲速伏見，于人事無關。²³

從這裡可以看出魏源思想的經世特質，因而以經濟民生為重心的觀點撰寫史書；因此，《元史新編》中的〈河渠志〉、〈食貨志〉甚見充實；在〈河渠志〉中，魏源表達他對治河的意見，以古今互證的方式，討論治河方案；在〈食貨志〉中則對貨幣的使用著墨甚多。在以考證為中心的《元史新編》中，屢屢出現經世的理念，並對元代史事加以評論，乃係在樸學考據中寄寓經世思想，此即魏源為清代史學由考據到經世之關鍵所在。

《元史新編》雖採紀傳體，但非一人一傳，而係採分期分類的寫作方式，使史事更有秩序的呈現，關於這一點梁啟超有中肯的評論：

魏著訛舛武斷之處仍不少，蓋創始之難也。但捨事蹟內容而論著作體例，則吾於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變舊史“一人一傳”之形式，而傳以類從。但觀其篇目，即可見其組織之獨具別裁。²⁴

在史學體例方面的創新，使魏源《元史新編》成為道咸時期具有指標意義的著作；因此，在討論此一時期的史學時，魏源的經世思想、考據和史學體例之創新，為晚清史學開啓新的契機，從而使得考據與經世不再有難以逾越的鴻溝，而兼具考據與經世特色的《元史新編》，亦成為具指標意義的著作，魏源亦因此成為晚清史學發展的關鍵性人物。

繼魏源之後，研究元史的學者有李文田(1834- 1895)，撰《元朝秘史注》；繼之者有沈曾植，撰《元朝秘史補注》，另著《蒙古源流箋證》、《元聖祖親征錄校注》²⁵。沈曾植為晚清到民國的蒙古史專家，在元史研究方面貢獻厥

五德終始與災異讖緯之說是西漢元、成、哀、平之際的特殊現象，《漢書》有〈五行志〉表現出班固的特殊史識；反對者認為災異讖緯之說是西漢元、成、哀、平之際所獨有者史書列為專篇，影響正史之體例。參考：杜維運，《中國史學史》，1(台北：三民書局，1993)，286-288。

²³ 魏源，《元史新編·歷志》，《元史新編》，69/1-2。

²⁴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440。

²⁵ 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學述略〉，《東方雜誌》，28.21: 76-77。

偉²⁶。沈曾植對元史研究的另一貢獻，是為〈唐代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鶻可汗碑〉做考釋，使唐代的突厥歷史出現新的解釋，糾正《新、舊唐書》中的一些錯誤²⁷。

李文田、沈曾植之後，續有學者從事相關研究，如施正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寶銓《元秘史李注補正》、丁謙《元秘史地理考》等²⁸，這些著作解決了部分因譯名不同而引發的元史地理問題，亦對開啓西北史地研究的風氣有所助益。

道咸時期及民國初年(1840-1920)，在元史研究領域，成就最高且最具代表性者，為一般所稱的元史三大家：洪鈞、屠寄與柯紹忞。

洪鈞(1839-1893)曾奉派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因藉出使之便，蒐集各國有關蒙古史地的資料，寫成《元史譯文證補》，洪鈞集6年之力完成此書，其間曾三易其稿²⁹。據陸潤庠的說法，此書取名“譯文證補”係「證者證史之誤，補者補史之闕」³⁰，由此可知洪鈞撰寫此書的初意仍在考據。

陸潤庠《元史譯文證補·序》指出，洪鈞在俄國發現拉施特哀丁的《史集》，因無人懂拉丁文，乃多方蒐求，得英文本《多桑蒙古史》，同時俄人貝勒津譯《成吉思汗傳》、英人霍渥爾斯譯《蒙古史》，於1888年刊行。洪鈞又將其他外文資料由譯人協助譯出一部分，並向當時的各國駐俄使臣請

²⁶ 王國維研究元史即曾受沈曾植的影響，參考：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韓儒林文集》，388。

²⁷ 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韓儒林文集》，388。

²⁸ 馬金科、洪金陵，《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敘論》，79；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學述略〉，《東方雜誌》，28. 21: 76-77。

²⁹ 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出版在過程中亦命運多舛，1893年洪鈞病逝，將未整理的初稿交予其子，另將已整理就緒的清稿交沈曾植、陸潤庠；1894年其子去世；陸潤庠為洪子岳父，受洪氏父子所託，決心續成該書。但因洪子死後，稿本散失，僅存沈曾植、陸潤庠手中的清本，故書稿並非完整。沈曾植據清本加以整理，定制體例，於1897年出版，計30卷，但其中10卷有目無文；參考：陸潤庠，《元史譯文證補序》，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收入：楊家駱(主編)，宋濂等，《元史》(台北：鼎文書局，1981，點校本)，冊7，附錄，3；〈目錄〉，1-8。

³⁰ 陸潤庠，《元史譯文證補·序》，洪鈞，《元史譯文證補》，2。